

第七章 合浦与秦汉帝国的“岭南”边疆

苏秉琦先生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是真正的南方”^[1]。本章将合浦地区的南越国遗存和汉代遗存置放在“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比较视野中，在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讨论汉代合浦置郡的历史背景，以及岭南秦汉时代合浦郡的历史地位，以期为更加全面深入地阐释合浦南越国时期考古遗存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提供学术支撑。

第一节 合浦置郡的历史背景

战国秦汉时代，“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2]。华南和东南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居民有句吴、于越、干越、东瓯、闽越、西瓯、骆越等诸多名目，其间具体关系并不能凿实。整体而言，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集团与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集团更具共性。

在考古学上，华南和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几何印纹硬陶、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铤为特征，与江西、湘西和湘南存在较大共性，这些遗存被认为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西汉时期南方地区的几何印纹硬陶传统仍然得以沿续。

苏秉琦这样概括岭南地区的先秦文化发展道路：“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3]。战国中期以后岭南的社会文化发展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仍然属于百越文化体系内部发生的变革。

吴越地区在百越人群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文献中关于越人的记载以江浙地区比较清楚，岭南一般简略。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越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的记载看，岭南和江浙的越人有可能发生过联系。刘波^[4]、郑小炉^[5]从考古学上论述过江浙地区越人向岭南的迁徙，近年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又显示出一些新线索。合浦发掘的两座战国至西汉初年土墩墓与江南地区形制相似^[6]；桂平大塘城 M3001 时代属于西汉晚期，构筑方式也有江南土墩墓风格^[7]。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存在一些土邦小国，见诸文献者如“缚娄、阳禺、驩兜之国”^[8]、“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9]、“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10]等，但是均不可确指。卜工认为，岭南青铜时代“有些地区虽然尚没有发现重大的遗迹现象和特别精美的高等级器物，也完全可以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推定古国的形成与否”

[11]。

卜工列出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代表的“夔纹古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以曲江矮石岗顶墓地为代表的“格纹古国”（西周春秋）、从福建九龙江流域向饶平浮滨遗址及岭南渗透的“釉陶古国”、以番禺南沙、东莞村头、深圳屋背岭等商代遗址为代表的“绳纹古国”、以武鸣马头元龙坡墓地为代表的“素面古国”（西周春秋）、以湛江峰背遗址为代表的“石矛古国”。同时指出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地显示出与武鸣一带古国传统的不同，普宁后山遗址以鸡型壶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引起注意^[12]。虽然以上划分只是粗线条的，而且有些古国的年代还可以讨论^[13]。但是岭南古国的形成“至迟在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已经全面启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中心，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有独特的标识”。

虽然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已经进抵桂林附近的湘漓分水岭，但是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方式尚有很大争论。祝诣博认为楚文化对岭南地区只是发生“渐进式的影响”，其实际影响力并未到达岭南地区，两个文化体并未形成互动关系^[14]。虽然岭南腹心地区并未发现典型楚墓，以及典型楚式器物和金郢爰、铜蚁鼻钱等楚国货币，不过春秋晚期以后岭南青铜器上确实可以见到楚文化因素。岭南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有楚式青铜礼器，“如恭城秧家出土的楚式鼎，清远马头岗出土的楚式浴缶，罗定南门峒出土的楚式尊缶和提梁盃”^[15]。以西汉初期罗泊湾大墓为代表，岭南战国秦汉墓中表现出来的“楚制”对岭南土著越族的影响不能忽视。

高崇文指出，战国时期岭南地区的越墓出现了底铺卵石或碎石、四角置人首或兽首柱形器等情况，圜底器锐减，逐渐流行平底器（瓮、罐），新出现三足器（罐形鼎和越式陶鼎），“随葬铜容器增多，特别是战国‘越式鼎’已发展到鼎盛阶段，……青铜兵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增，出现许多新的因素，除了原有的器类如戈、矛、扁茎剑、镞等的形制有所发展变化外，大量地出现了圆首有格剑、扇形钺、靴形钺等新器类”^[16]。这其中，扇形钺、靴形钺“可能是岭南越族在工具铜斧的基础上自主发明的新兵器”，圆首有格剑起源于吴越地区^[17]，“还有一些铜礼器，如恭城秧家出土的尊、罗定北门峒、背夫山出土的鉴，则表现出江浙一带吴越青铜器的作风”，越式鼎则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湘中、湘南地区^[18]。

从岭南出土的青铜器分析，“广东中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春秋后期以来的铜器来源是多元的，湖南、吴越和当地土著三方面铜器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铸造了本地高度的青铜文明，并将之推向一个高峰”^[19]。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吴、越连年征战，至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大败越，……而越以此散”^[20]，徐恒彬认为楚、吴、越之间的这些战争客观上影响了岭南地区的政治变化、人口迁移，战国后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与楚国势力的南扩和秦始皇灭楚、统一岭南发生着密切关系^[21]。郑小炉认为“吴越人向岭南的迁徙过程至少从春秋晚期就已经开始，战国前期迁徙的规模更大”，封开利羊墩^[22]、德庆落雁山^[23]、罗定背夫山^[24]、广宁铜鼓岗^[25]等地东周墓或者为吴越人的遗存，或者与吴越人有着密切关

系^[26]。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平定岭南，这是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中原文化冲击的力度骤然加大，岭南越人的文化属性开始转型。始兴白石坪、增城西瓜岭、博罗银岗二期、封开利羊墩、广宁铜鼓岗、广宁龙嘴岗等遗址和墓地“米”字纹已经退化^[27]。“与这一陶器群共出的还有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青铜带钩、玉带钩、陶马泥塑模型、青铜盖弓帽等车马器及铁锛、锄、斧、铤、凿、削、刮刀、矛等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吴海贵认为这些体现建筑结构风格、服饰文化、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非岭南越人文化因素应该视为秦统一岭南的界标性实物，据此可以将这批遗存推定在秦至南越国时期^[28]。

西汉前期南越国割据岭南，“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29]。高崇文认为南越国时期是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生大的变化的又一个阶段，南越国墓葬“完全吸收了楚制并作了改进”，基本上改变了先秦越墓的传统形制，占绝大多数的土坑竖穴木椁墓大多分出头箱、边箱、棺室；罗泊湾一号墓的椁内分室结构与楚墓相似，二号墓属于楚墓椁室的改进型；象岗南越王墓后部的分室布局亦是楚墓椁室的改进型^[30]。就随葬器物而言，除秦汉系统的蒜头壶、扁壶、釜、釜甑、汉式鼎、钫、圆壶和传统的越式鼎、印纹硬陶罐、瓮、甑等越式器物以外，大中型墓中多见楚式或仿楚式的鼎、壶、罍、盘等礼器，铜尊、铜镜和漆器多属楚文化系统^[31]，簋形盒也渊源自楚文化^[32]。

西汉初年的帝国疆域，较秦王朝大为收缩^[33]，属于百越居民活动区的岭南、东南沿海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已经不在畿内。元鼎五年（前 112 年）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击南越，元鼎六年冬番禺城破，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此时被纳入两汉帝国的郡县体制。

西汉中后期，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除竖穴分室木椁墓继续流行以外，广州地区出现前部横向木椁、后部分室木椁的前后室墓，贵县、合浦等地还出现用木椁制作的带耳室墓（主墓室是分室木椁、墓道旁侧用木椁制成单耳室或双耳室），均是仿自中原地区的砖室墓。具有地域特色的越式鼎、三足罐、三足盒、联罐、甑等陶器基本消失，鼎、壶、钫、提梁壶、尊、铸、釜、釜甑等汉式铜器开始流行，屋、仓、井、灶等模型明器和陶塑家禽家畜俑发达起来。以此以后。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和演化线索与中原地区逐渐一致，岭南作为西汉帝国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逐渐减弱，岭南考古学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1] 苏秉琦：《序——岭南考古开题》，《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 年。

[2]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2001 年，第 92 页。

[4] 刘波：《岭南地区青铜器分群研究》，《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 年。

- [5] 郑小炉：《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例证》，《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 [6]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7]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 [8] 《吕氏春秋·博君览》。
- [9] 《山海经·海内南经》。
- [10] 《逸周书·王会解》。
- [11]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2] 卜工：《岭南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三卷第二期，2005年。
- [13] 李龙章认为广西右江流域的武鸣元龙坡、武鸣安等秧等墓地的年代可能晚至战国晚期甚至西汉。见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14] 祝诣博：《楚与两广越文化初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15]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6]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7] 李伯谦：《东周式铜剑渊源初探》，《文物》1982年第1期。
- [18] 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 [19]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 [20]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21] 徐恒彬《论岭南出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 [22]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23] 徐恒彬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 [24] 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2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26]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236页。
- [27] 参见李龙章：《南越王墓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编年》，《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年；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器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年第4期；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深圳文博论丛》，2010年。
- [28]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0~391页。
- [29] 《史记·西南夷列传》。
- [30]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1] 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2] 高成林：《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簋形盒渊源试探——从簋形盒看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33]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 [34] 《史记正义》：“景帝时，汉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为郡。吴、长沙之国，南至岭南；岭南、越未平，亦无南边郡”。

第二节 岭南秦汉时代合浦地区的历史地位

南越国的疆域奠定了岭南汉代郡县的基础范围。张荣芳认为南越国的东北边界略跨过今闽、粤省界，抵闽西南的平和、漳浦等县；北界大概为五岭；西面达今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百色、德保一线；向南则包括今越南北部地区，东南濒南海^[1]。不过刘焱鸿认为南越国疆域最东不过揭阳，东江沿线的龙川—博罗—番禺一线以东地区是不稳定的政区边界^[2]。

岭南地区秦汉考古学材料很丰富。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北江上游的乐昌、西江流域的肇庆、郁江流域的贵县、贺江流域的贺州、漓江流域的平乐、右江流域的武鸣、北部湾东北岸的合浦、雷州半岛的徐闻、越南北部的清化等地均有大量南越国墓或汉墓的发掘报导。

根据墓葬材料，南越国境内大致可以划分为桂东北—粤西、珠三角、粤北、桂东南—粤西南、越南北部等几个主要考古学文化区，桂西区、粤东区可能在南越国疆域以外。这其中，桂东北—粤西区、珠三角区、粤北区共性更强，桂西区、粤东区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差异较大。南越国灭亡以后，大致可以划分为桂东北、西江流域、珠三角、粤北、桂中、南路、越南北部、越南中部、粤东、右江流域和海南岛等几个主要考古学文化区。这其中，桂东北区、西江流域区、珠三角区、粤北区、桂中区共性较强，越南北部区、右江流域区存在某些共性，越南中部区和海南岛区较为特殊。这些认识与《绪言》部分论述的行政空间结构和族群分布空间结构大致吻合。

一些具有标识性的葬俗和文物亦显示出岭南考古学文化的空间结构。例如“架棺”见于桂东北、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岛，腰坑以漓江—桂江以西的西江流域最为集中，汉式瓦件见于广州^[3]、兴安^[4]、五华^[5]、澄海^[6]、徐闻^[7]等地；人面弓字格铜剑^[8]的出土地点自广西柳江、越南清化东山至香港大屿山构成一个三角地带，与越南东山文化相似的人像茎青铜剑亦见于湖南树木岭 M1^[9]。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提筒上刻绘有船纹和羽人^[10]，羽人船形纹饰常见于西南铜鼓（据 1980 年代初统计，国内收藏铜鼓有 27 面见有羽人船形纹饰，越南有 13 面^[11]）；羊角钮铜钟不仅见于岭南，还见于越南北部、云南、贵州和湘南，合浦文昌塔出土的一字格铜剑（M33:1）是滇池地区、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文物出现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或考古学文化区中，虽然没有与陶器构成比较稳定的组合关系，但是仍然能够反映出岭南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空间结构的某些侧面。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构成汉代岭南地区的一个人文板块，考古学文化表现出某些共性，主要包括雷州半岛、北部湾东北沿岸和越南北部平原、越南中部沿海地带。这其中，雷州半岛及其东西两翼的茂名、合浦地区，习惯上称为南路（合浦地区 1959 年至 1965 年隶属于广东管辖）。南路地区汉墓主要集中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合浦（包括北海盘子

岭^[12]、高州^[13]等地点)和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其中徐闻汉墓发现近300座,主要包括五里镇、华丰村、红坎村等地点。

合浦地区的南越国墓葬均为小型长方形土坑墓,多数无墓道;出土陶器有瓮、罐、杯、盒、甑、钵等,常见拍印方格纹、方格纹加戳印纹、弦纹、篦纹等^[14]。西汉中后期一般为中小型墓,主要是竖穴木椁墓,多数带斜坡墓道,没有二层台或墓底设腰坑、器物坑的情况;基本不见陶瓮,出现鼎、盒、壶、钫等仿铜陶礼器,井、仓、灶、屋等陶制模型明器的组合较为完备,陶罐、罍、鬯较为常见,铁三脚架有较多发现,提筒、匏壶、甑等越式陶器尚有一定数量,见有瘞钱习俗。

合浦地区东汉前期出现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砖木合构墓的出现晚于广州汉墓,随葬器物组合与西汉晚期相似。陶器组合以罐和井、仓、灶、屋为大宗,瓮较少见,陶壶、簋较常见,陶钫消失,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装饰品较为丰富。东汉后期流行结构复杂的砖室墓,陶器组合仍以罐与井、仓、灶为主,但是数量增多,器型变化较大;篆刻花纹铜器趋于衰落。合浦东汉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岭南其他地区及中原地区基本无异,唯陶器外表多施青黄釉。

两汉时期合浦地区有许多内地移民,包括流徙岭南的罪徒(仅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年)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三十年间,“徙合浦”者就有10余起^[15])。秦汉政权多次徙民南下,先进的农业工具和农耕方法传入岭南,文献记载赵佗从中原输入铁农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并提倡“耕种”。堂排M2B出土铁锄5件、泥锄10件,风门岭M28出土铁耜(锄)1件,风门岭M26出土磨锄俑一件,这种横宽刃,铁鏃作凹字形的锄即可能由内地移民带入。风门岭M22出土的双齿铁镬适用于粘性土壤,西汉晚期墓中可以看到用铜锅装着的稻谷,模型明器粮仓出土很普遍。北流铜石岭还发现东汉南朝时期的冶铜遗址^[16]。

合浦郡在岭南九郡中位置居中,不但是南海郡与交趾三郡的交通节点,而且经由南流江可以北通苍梧郡、郁林郡以至中原,海航还可以抵达儋耳郡、珠崖郡,西汉路博德和东汉马援征伐交趾均经行合浦。合浦汉墓的簋形盒^[17]、滑石器、漆耳杯上的勾云和凤鸟纹饰都是楚地文化因素,熊昭明认为合浦汉墓灯具的出现亦是受到楚地文化影响^[18]。望牛岭M1出土的两件分别朱书隶体“九真府”和“九真府口器”的陶提筒、黄泥岗M1的滑石“徐闻令印”、堂排M1的“劳邑执割”琥珀印等器物充分说明了合浦郡的交通中枢地位,合浦汉墓出土的舶来品更显示出在海外交通上的重要性。

百越集团的分布范围不仅局限在中国南方,方国瑜认为源于百越的古代族群可以分为“越族”和“掸族”两大族团。古代“掸族”居住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沿至印度曼尼坡弧形地带,包括今老挝、泰国北部、缅甸掸人地以及阿萨姆区域^[19]。广州汉墓M1030、罗泊湾1号墓殉葬坑里的4具圆木棺均是独木舟状,武鸣M56墓圻成船形,越南

北部也有一批以越溪 M2 为代表的以独木舟改制的船棺。船棺葬俗广泛见于四川、江西、岭南、越北、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文化史上一种意义深远的葬俗。铜鼓和靴形铜钺在中国西南、岭南和东南亚各地有广泛分布，百越稻作在不晚于秦汉时期亦对南洋群岛发生了影响^[20]。百越集团在境域内外的广泛分布，是汉代岭南与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的基础背景之一。

越南北中部发现有龙编、螺城、麋冷、湄城等汉代城址，在清化等 53 处地点发现汉墓 230 余座^[21]，出土大量汉式器物。在中南半岛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包括越南南部的平阳省新渊县扶正遗址、泰国南部的那空是贪玛叻府差旺遗址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出土有汉代铜镜^[22]，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出有汉代五铢以及与广州汉墓相似的陶器^[23]，苏门答腊出土有初元四年（前 45 年）纪年铭文的陶鼎，而“秦汉农业技术体系中对东南亚稻作农业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是金属农具和牛耕的普及推广”^[24]。

随着西汉郡县在越南北中部的设立，汉文化以越南北部地区为桥头堡，向中南半岛西部和东南亚岛屿渗透。这是汉代岭南与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的基础背景之二，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则构成了汉代岭南与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的第三个基础背景。南越国时代的合浦地区和两汉时代的合浦郡在这些基础背景中发挥着转承起合的重要作用，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最近在越南北宁省顺城县陇溪墓地发掘的东汉晚期土墩墓（2017BTLM1），以及合浦汉墓中新近识别出来的一组越南北部汉墓的文化因素，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 [1]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第二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95页；余天炽、覃圣敏、兰日勇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56页。
- [2] 刘焱鸿：《历史文本与物质文化：以南越国为个案》，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8页。
- [3]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海幢寺汉代窑场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3年第3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兴安县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 [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年。
- [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澄海市博物馆、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8] 邓聪：《人面弓形格铜剑锥议》，《文物》1993年第11期。
- [9] 高至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文物》1980年第12期。
- [10] 《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 [11] 李伟卿：《铜鼓船纹的再探索》，《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2] 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3] 钟绍益等：《广东高州军墟后岭发现两座东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 [14] 梁旭达：《广西汉早期墓葬初步研究》，《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七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 [15] 蒋廷瑜：《再论汉代罪犯流徙合浦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5期。
- [17] 高成林：《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簠形盒渊源试探——从簠形盒看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楚文化研究论集》（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18] 熊昭明：《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 [19]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 [20] 游修龄：《百越稻作与南洋的关系》，《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1993年；田中耕司：《马来稻作及其扩展》（续，彭世奖等译），《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 [21] 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023~10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79页。
- [24] 朱宏斌：《秦汉时期传统稻作农业科技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1期。